

沙俄对外扩张历史翻译资料

(三)

西北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印

一九七五·十。

革命前斜米列契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
УЙГУРСКОЕ И ДУНГАН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СЕМИРЕЧЬЕ

加鲁佐

П. Г. ГАЛУЗО

西北大学编写组译

关于维吾尔人和东干人迁住谢米列契地区的原因、情况和过程，近年来在М. Н. 卡比洛夫 (1) 的著作中以及М. 苏珊罗、Ю. 巴拉诺娃 (3) 评述杜尔古诺夫 (4) 和X. Ю. 尤苏洛夫 (5) 二人学位论文的文章中都曾做过详尽的论述。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俄国占领伊宁，后来又归还中国）产生的这次移民，А. Л. 纳洛契尼茨克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文中，也作了具体的分析。(6)

但是，对于沙皇时代谢米列契地区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的状况，则缺乏详尽的研究。前不久，М. 苏珊罗 (7) 出版了他的论述北吉尔吉斯东干农民历史的著作，另外，X. 尤苏洛夫 (8)、И. И. 尤苏波夫 (9) 以及奥多也夫斯基 (10)，也发表了文章。这就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有关论述谢米列契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了。虽然，大部分作者（特别是М. 苏珊罗）列举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但是，读者对于革命前谢米列契地区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的状况，仍然不能得到一个总的印象。对导致维吾尔族和东干族积极参加一九一六年起义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社会矛盾，也没有揭示到应有的程度。至于对目前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的历史，那就叙述得更差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历史资料的缺乏。

关于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的经济状况的评述，上述作者的根据仅限于1910—1911年间，在П. П. 鲁美采夫领导下对谢米列契省所

进行的众所周知综合调查报告第五卷（11），以及B.瓦西里耶夫《移民区——谢米列契省》一书（12）。就连最近论述维吾尔和东干居民区社会关系问题的一部作品，首先也是依据П. П. 鲁美采夫的调查记录写出的。当然，为了揭示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农业发展的历史，仅仅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研究的是革命前谢米列契地区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农业经济的发展；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农村的阶级分化以及导致农民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劳动人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同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一样，本文作者的统计数字也同样是以先前的统计资料为依据的。在某种程度上，考察从一八七六年起，也就是说从他们留居在固尔扎（伊宁——译者）地区的时候起，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批判地评价已发表的统计资料，首先是П. П. 鲁美采夫的《资料》（13），提供了可能性。

列宁在一九一一年写道：“俄国革命和亚洲的革命——为排挤十月党式的资本而代之以民主的资本的斗争。”（14）因此，列宁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有两条道路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国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正不断向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渗透，而这些国家中雄厚的封建主义残余，又是同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着手研究维吾尔和东干居民的土地关系。上述所有关于维吾尔和东干族居民区社会矛盾的调查者，都没有对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历史学家们就已提出的列宁关于哈萨克斯坦农业

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的理论，能否适用于这一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15) 显然，他们以为在这种具体条件下，没有理由来谈论“为排挤十月党式的资本而代之以民主的资本的斗争”。我们的调查表明，事实上完全相反。革命前谢米列契地区维吾尔和东干居民区的土地关系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维吾尔和东干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农民的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並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得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使这一运动在民主革命阶段，客观上成为争取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的斗争。

一、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从伊宁地区向谢米列契迁徙时，沙皇政府的目的

由于我们的任务仅仅限于调查谢米列契地区维吾尔和东干居民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对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沙皇俄国又把伊宁归还中国(16)的这一外交关系的复杂情书则不予涉及。我们只是说明维吾尔人和东干人迁徙的原因和当时沙皇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

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签署了把伊宁地区转给中国的圣彼得堡条约，就缔结这个条约而举行的谈判，是在沙皇政府千方百计想使同中国接壤的谢米列契地区保持安宁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中国背后英国还有很大的势力。这样，在条约中也就出现了第三条规定，凡伊宁地区居民“从该地移交中国之日起一年内，可携带动产移住俄国境内”。(17)

维吾尔东干农民获悉中国的封建主又返回伊宁地区的消息时，都急

于要到谢米列契去。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想摆脱中国政权，以及维吾尔东干族“自己的”封建主。沉重的和日益加剧的封建剥削，不惜毁灭成千上万的生灵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暴行，迫使农民为了活命和进行个体农业生产，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因此，他们利用圣彼得堡条约之便，天真地指望在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自由自在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从农民方面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以自己的逃跑给封建主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试问沙皇政府，首先是土耳其斯坦总督，为什么决定利用农民的这种欲望呢？

土耳其斯坦总督在关于移民问题的指令里以军事上的理由论证了这一点：“一旦同大清政府（应该是同中国后面的英国——作者）发生冲突，我们将来就能在中国边界保持一批完整的、随时准备同中国人打仗的骨干力量，他们由于叛逆祖国，被弄得流离失所，倾家荡产，而极度仇恨中国。伊宁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如果仍留居在原来的地方，那将会象现在准噶尔地区的穆斯林一样逐渐地被消灭掉；或者由于中国当局的宽容，伊斯兰教徒和中国统治最终达到和好，这样一来，不管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我们将要失掉这一批人。（18）

土耳其斯坦当局，竭力“确保”俄中边界的安全，以免军事冲突。土耳其斯坦军事领导的上层人物也看到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这种人是“随时准备同中国人战斗的一批骨干力量。（定员）

迁徙的另一个理由，是沙皇企图加强靠近中国边界的谢米列契地区的经济潜力。谢米列契省总督费里德（Фриде）将军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十日的移民奏折中这样评价其意义：“定居人口的增长率，通过从内部省区迁移的方式是相当慢的，二十五年间农民和手工劳动者的数量仅仅相当于伊宁移民一年的数量。伊宁移民耕种至今仍大片荒芜，只有少量吉尔吉斯人（应为哈萨克人——译者）开垦过的这些辽阔肥沃的土地，对于发展本省的生产力，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

但是，费里得所提到的八十年代谢米列契地区经济力量的加强，导致了伊宁地区农业的衰落。对于“发展本省的生产力”，和削弱伊宁地区的经济，费里得表示满意，他并且对这一措施在政治上的作用也作了评价。他写道：“有充分的把握确信，万一同中国发生外交冲突，这些移民在战时一定会为我们立大功的。”（20）

沙皇的将军们计划把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作为“随时准备”同中华帝国斗争的“骨干”力量，这对移民是公开的。迁移期间，土耳其斯坦代总督科尔巴科夫斯基（Колпаковский）将军，于1882年1月10日命令费里得将军（当时负责向中国移交伊宁的全权委员），向移民宣布了三项迁移条件：第一，不能指望政府的物质救济，……第三，迁移后用公共经费开办学校，并使他们自己的儿童学习俄语。对于官方当局来说，最主要的当然是第二条。条文规定：“所有迁移到俄罗斯帝国的居民，除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作者）以外，被安置在新的地方以后，要按照一般规定服兵役，或者加入哥萨克军”。（21）

但是，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来自中亚细亚边界，特别是中国边界军事的威胁消失了。因此，对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的态度也就改变了。打算把他们列入哥萨克阶层的计划以后没有进行讨论；关于他们服兵役的问题，按照沙皇于1887年1月12日批发的内阁会议意见：“从一八八七年开始征集”“省内的一切俄罗斯居民服兵役，其中包括虽然族源不是俄罗斯人，但已在此地定居生活，并成为城市和农村人口者。”在实际上，只是那些变成市民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才能按这条规定服兵役，因为后来“一切异种居民，不管是游牧的，还是定居的”，普遍地免除服兵役，那么，农村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就不会吸收他们了。(22)

M. 苏珊罗认为：俄国政府负担了“把东干人和维吾尔人迁移安置在谢米列契的费用”，是因为“地方当局把伊犁地区的东干人和维吾尔人看作是一批廉价的劳动力”，(23)这是很不正确的。事实是，沙皇当局为了有利于发展农业，需要依靠的是农民，因为当时省内还没有工业，所以政府也不需要“廉价劳动力”，雇佣劳动在当时还不存在。

Ю. 巴拉诺娃认为，把“伊犁地区的大多数伊斯兰教居民”“迁移在谢米列契，是“违背俄罗斯和清朝当局意愿的”。(24)这种看法同样也是不正确的。事实证明，要研究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的迁移问题，就必须联系沙皇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沙皇政府正是千方百计地利用维吾尔和东干族农民对伊宁地区日益加剧的封建剥削的革命义愤，来达到自己的反动目的。圣彼得堡条约的有关条文和沙皇政府后来在移民问题上所采

取的措施，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二、迁移期间的维吾尔族和东干族农民

根据费里得——潘土索夫统计的资料， (25) 从伊宁地区迁入的维吾尔族和东干族移民数量，可看表一所示：

表 一

民 族	1884年移 民 户 数	人 口		
		男	女	合 计
东 干	1147	2439	2243	4682
维吾尔	9752	24628	20746	45373
计	10899	27067	22988	50055

根据一八八〇年伊宁地区征税户数报表，费里得和潘土索夫认为，迁移后的伊宁地区维吾尔人只剩 2565 户，东干人剩 344 户。 (26)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维吾尔人迁移户占 79.2% 左右，东干人迁移户占 76.2% 左右。

根据潘土索夫的统计，一八七六年伊宁地区所有地方居民（除过原来的俄罗斯人），男女总数为 129,558 口 (27) 。根据我们统计，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约为 1.8%。这就说明，临近一八八一年时，此地居民显然已达 141,000—142,000 口。迁移到谢米列契的有 50,000 人，要占总数 35% 以上。如果同时还统计哈萨克游牧民的话，那就

约占总数的54%。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国民经济，军力和经济的实力，确实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伊宁地区两个维吾尔居民乡的游牧帐棚（即户数）的统计表中，可以反映出，一八七六年迁移前，维吾尔族农民的状况。（28）（请看表二。）

表二中的统计资料，反映了维吾尔族农村的阶级大分化。完全没有牲畜的农民已达22.3%。农民赤贫的分化，是由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且由于资本主义还不发达，也不可能使他们变为无产者，到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去谋生。有7%的农户，甚至连住房都没有，而栖息在别人的屋檐下。

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占29.4%），是没有和仅有一匹马的贫农。这样，完全破产和即将完全破产的农户就占总数的52.7%。中等农户（第四——六类），占农户总数的44.9%。占2.4%的（第七——九类），是维吾尔乡村剥削阶级的上层人物。其中又有十四户大牧主，（折合成马匹数达10匹）。贫农（占52.7%）拥有牲畜数仅占14.6%，而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占2.4%）拥有的牲畜数已达24.6%。

维吾尔乡村此种分化现象，于一八八八年在扎尔肯特地区（伊犁河左岸）的开特细乡也可看到。这个乡在一八八二年是俄罗斯帝国管辖的一部分（29）（请看表三）。

表 二

类 别	农户数		人 口 数		折合成马匹数※		房 屋 数	
	总 数	占 %	总 数	每 家 平均数	总 数	每 户 平均数	总 数	每 户 平均数
1 没有牲畜数	541	23.3	2261	4.18			504	0.93
2 没有马匹数	144	6.2	666	4.63	375.94	2.61	143	1.00
3 有一匹马的	539	23.2	3289	6.10	1354.93	2.51	577	1.07
4 有二匹马的	767	33.1	4262	5.56	3778.45	4.93	812	1.06
5 有三匹马的	213	9.2	1391	6.53	2465.02	11.57	222	1.04
6 有四匹马的	59	2.6	443	7.51	993.13	16.83	64	1.08
7 有五匹马的	19	0.8	167	8.79	531.70	29.56	20	1.05
8 六—八匹马的	24	1.0	174	7.25	951.74	39.66	26	1.08
9 九匹以上的	14	0.6	134	9.57	1413.96	101.00	17	1.21
总 计	2320	100.0	12787	5.51	11894.89	6.3	2385	1.03

表

三

类别	农户按 马匹数 分类	农户数		人口数		折合马匹数	
		总数	%	总数	每户 平均数	总数	每户 平均数
1	没有牲畜	64	10.0	219	3.42		
2	没有马匹	30	4.7 61.0	141	4.70	20.33	0.68
3	有一匹马	296	46.3	1412	4.77	964.78	3.26
4	有二匹马	204	31.9 36.9	1243	6.09	1948.38	9.55
5	有三匹马	32	5.0	231	7.22	556.02	17.38
6	有四匹马	10	1.6	61	6.10	425.41	42.54
7	五匹以上	3	0.5 2.1	25	8.33	669.11	223.04
	总计	636	100.0	3332	5.21	4583.97	7.17
	1884年 统计	760	118.9	3787	4.98	?	?
	1884年 比1888 年的缩小 数	121	18.9	445	3.68	?	?

由上表可见。完全破产和即将破产的农户（第一——三类）占总农户数的61%（比较哈诺霍伊斯克与卡伊纳克斯克乡仅占52.7%），属于中等状态的这一类农户占总农户数的36.9%。剥削阶级

的上层人物有十三户（占2.1%），他们中的三户是占有大畜群的封建主。每户折合成马匹数为223匹。但是，从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八年全乡农户减少了18.9%。这些农户的减少，是迁移到别的乡去了。就家庭成员的平均数来说，（与一八七六年统计资料相比）他们在富裕程度上是属于较低的一类。这就说明，这个乡在转入俄罗斯国籍时，据不完全统计有七百六十户，其中三类社会地位低下的五百一十一户，（占67.2%），属于中等地位的有二百三十六户，（占31.1%），而富豪十三户，仅占（1.7%）。

这个统计资料，是经过十二年以后，以哈诺霍伊斯克和卡伊纳克斯基两个乡的帐蓬记载的资料为基础的。而它的更进一步更正，是一八八四年，即把开特细乡归于谢米列契后的一年所统计的资料为依据的。假设，在一八七六年开细特乡财产分化，大约同附近的哈诺霍伊斯克和卡伊纳克斯克一样，（如表二）那末，可以把表三中的数字与表二相比，把它看作是维吾尔族农民在伊宁地区居住几年经济分化的结果，富农户和封建主所占百分比从2.4%下降到1.7%。两个上层社会阶层的农户中，快到一八八八年，牲畜的平均数在增加，根据八类中的统计数字增加了7.3%，九类中的统计数字增加了120.8%。贫农的数量很快增长了，中农的数量减少了。富农，特别是大封建主发了财。农民同日益加强自己财产状况的封建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尖锐化了。

显然，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三年，在伊宁的维吾尔和东干居

民区，究竟那些社会阶层愿意留居原地，那些人愿意到谢米列契，这个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维吾尔和东干农民迁移前后，家庭人口数字的统计，也可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

一八七六年，卡伊纳克斯克乡和哈诺霍伊斯克乡两乡的维吾尔族，平均每户人数是5.51口，一八八八年，没有移民的开缅特乡，贫农占相当大的比例，每户人数平均有5.21口。一八八四年，经过迁移谢米列契的维吾尔人，平均每家有4.63口。换言之，移民家庭人数与他们迁移之前的数量，以及没有迁移的维吾尔人家庭人数相比，是减少了。

至于东干人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一八七六年，在伊宁他们平均每家有3.73口人，在一八八四年迁居到谢米列契后，他们平均每家有4.08口。这里，对于东干人来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家庭平均人口数在增加。

按已经列举出的有关维吾尔人口统计和东干人口统计可以看出（见下列表），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的人口发展情况，如同俄罗斯农民，以及其他中亚细亚农民一样，有一个规律，即富裕户的平均人口在增加，贫穷户的平均人口在减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中的富裕户和封建领主拒绝迁移，东干族中只是某些富裕户迁移了，而贫民，多半是家庭人口不多的城市小手工业者，拒绝迁移。

事实也正好说明，维吾尔族农民中贫农首先急于要迁移到谢米列契去。

下面就是一八八一年秋季来到契里克（Чилик）河和查林（Чарым）河流域的一百一十九户维吾尔家庭经济情况的统计表。

(30) (见表四)

来到这个地区的维吾尔人，按每家牲畜的平均数，低于一八七六年表二所统计数字的第三类（占有一匹马的），同时，移民中平均每四、五家中就有一户没有马。

这样，第一批维吾尔族移民按财产来说是贫民。紧跟着他们以后迁去的是生活上较有保障的人。关于维尔内（阿拉木图——译者）县三个乡（卡拉姆斯基、马勒巴耶夫斯基和卡拉苏伊斯基）移民家庭经济情况，列表如下。(31) (见表五)

表五中的数字与第一批移民（到契里克和查林河流域）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第二批移民的基本群众要比第一批生活有保障。他们平均每家带来牲畜 3.65 头，而第一批移民每家仅 1.71 头。然而在第二批移民中没有占大量牲畜的农户，这一点在下列契里克河岸扎依采夫斯基村维吾尔移民所带财产统计表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日统计），(32) 就可以看出。（请看表六）

表 四

类 别	农户按马 匹数分类	农户数		男女人口		各类牲畜折合 马 匹		财 产 (按户布计)	
		总 数	%	总 数	平均每 户 数	总 数	平均每 户 数	总 数	平 均 每 户
1	没有牲畜户	8	6.7	25	3.11			163	20.37
2	没有马匹户	17	14.4	48	2.83	12.66	0.74	320	18.82
3	有一匹马户	65	54.6	221	3.40	97.82	1.50	1286	19.78
4	有二匹马户	23	19.3	99	4.30	69.49	3.02	770	33.48
5	三匹以上户	6	5.0	23	3.83	23.42	3.90	140	23.33
	合 计	119	100	416	3.50	203.39	1.71	2679	22.51

表 五

移民带来的财产	数 字	
	总 数	平均每户
	3548	1.13
马	7877	2.50
牛	7389	2.35
绵羊	23	
骆驼	84	
驴	11477.0	3.65
全都牲畜折合马匹	2401	0.76
大车	61243	19.46
粮食 (普特)		